

韩南汉学
研究译丛

The Invention of
Li Yu



创造李渔

Patrick Hanan

[美] 韩南 / 著
杨光辉 /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The Invention of
Li Yu

创造李渔

Patrick Hanan

[美] 韩 南 / 著

杨光辉 /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李渔 / (美)韩南著; 杨光辉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444-2180-5

I. ①创… II. ①韩…②杨… III. ①李渔(1611~约1679)—生平
事迹②李渔(1611~约1679)—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0780号

责任编辑 徐泽春

装帧设计 王 慧

创造李渔

[美]韩南/著

杨光辉/译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2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2180-5/I·0031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言^[1]

喜剧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剧的主流模式,中国的“说教”文学中,幽默亦非罕见因素。当然,喜剧、幽默与严肃的目的并不矛盾。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渔最专注于喜剧,富有多方面喜剧才华,是中国最卓越的喜剧大师。首先,他对自己作品的喜剧效果引以为傲。当然,其全集中占极少数的作品不能算是喜剧;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学者就是抓住这些作品——特别是描述战争的残酷以及被迫“剃发”(由满族统治者强制推行的一种忠诚检验)带来的耻辱的诗歌——来揭示所谓的“真”李渔。这些诗歌虽然感人,但作为诗歌本身却并不出色。如果不是有“假”李渔的存在,我怀疑许多人会懒得去读它们。本书关注“假”李渔,及其通常具有喜剧色彩的自我蜕变,而不愿对“真”李渔作任何探究。

本书书名没有提及李渔的喜剧,而提及他的创造,有以下几重含义:他的自我创造(“假”李渔),他对生活和文学中创新的强调,他在许多领域中纯粹的创造性,以及他富有创造性的产物,其中最常见的是他的小说、戏剧和散文;可惜的是,他设计并建造的房舍与花园都湮灭已久。

在中国所有的前现代小说家中,李渔给我们提供了将其思想与艺术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最佳机会:首先,因为他留下了大量的作品,涵盖各种体裁,

[1]此书1988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它以1981至1987年间的研究为基础。那时,只有少数几位学者从事李渔研究。当然,从那以后,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李渔的学术研究成果。我希望此书依旧具有研究价值。

这一点可说没有其他作家已做到；其次，因为他有着清晰连贯地向读者阐释自己观点的热情；第三，因为他的作品高度地成为一个整体，允许甚至要求一种全面的批评方法。

这至少是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同时也是本书隐含的论题。我没有企图追溯李渔思想的历史渊源。因为关于渊源所在少有疑问，即来自何心隐、李贽，尤其是袁宏道的思想，他们都是哲学家王阳明遥远而又独立的追随者。李渔热情鼓吹新生活与新文学，便来源于李贽和袁宏道的思想，尽管他们都没有得出李渔那样极端的结论。类似的，李渔对快乐原则的信仰与何心隐及李贽的思想有关，他对文学个性化方面的关注则与李贽和袁宏道的思想有关。但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思想转换。李渔似乎并未认识到他的“受惠”，如果那是“受惠”的话。因为他所撷取的观念在 17 世纪的中国已经是公共财富，并可能以多种途径集合在他身上。尤其重要的是，他对自己观点的阐释与上述三位有所不同。追溯李渔与以上三位为主要代表的大趋势的联系，会使我偏离揭示其思想和艺术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这一目的。而且，他的思想并不单单从那些趋势中来。尽管称李渔为在清朝才崭露头角的头脑冷静的考证学派的先锋会有点牵强，但在他身上，的确存在着浓重的、可感知的怀疑论，一种即使只是在说笑，也要求客观证据的倾向，这就与流行的王阳明儒家心学形成了对比，属于一个新时代。

李渔还有不能忽略的另一面。他写作不仅仅是为了取悦自身、使公众铭

记其思想以名垂青史,他写作亦是为了谋生。

因为他是靠售卖作品为生的职业作家,他写作的具体内容、雅俗程度和基本格调大多受此支配,对此,我们需要将其思想和艺术一起加以研究。

最后,我要感谢来自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许多学者和图书馆员,由于人数众多,此处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晓玲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伊藤漱平(Itoh Sohei)教授,感谢他们允许我使用他们自己收藏的李渔作品的珍稀版本。

韩南于哈佛大学 2006 年 12 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写作谋生	1
第二章 创造“自我”	37
第三章 创造需要	52
第四章 享乐第一	66
第五章 倒置能手	81
第六章 情色作者	113
第七章 “密针线”师	136
第八章 休闲专家	174
主要参考文献	193
后 记	199

第一章 写作谋生

1673年,冬日将至,当时中国最畅销的作家李渔发现自己在北京进退维谷:既无钱驻留,又少钱离开。伴随他的是两个从南京家中带来的女孩。作为一条规矩,李渔在其“打秋丰”之旅中喜欢带上一两位侍妾,但这次两个女孩都怀孕了——至少看上去是怀孕了。(实际上,他所宠爱的王姬并没有怀孕,而是身患重病,并将在新年过世。)更为糟糕的是,李渔在北京的主要联系人礼部尚书龚鼎孳——杰出的诗人、美食家,穷困潦倒的作家与艺术家经常的“庇护人”——新近病倒并辞职。尽管龚氏天性慷慨,但他实际上已相当贫困。这一状况无疑是李渔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1]

北京之旅筹划已久。1671年晚些时候,李渔独创的辉煌之作《闲情偶寄》一出版,他就寄给了以前在京城资助人——礼部尚书龚鼎孳、吏部右

[1] 龚鼎孳的慷慨大方具有传奇色彩。李渔在《大宗伯龚芝麓先生挽歌》(浙江古籍出版社编《李渔全集》卷二,页55-5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译者按:英文原著出版于1988年,其时浙江古籍出版社版《李渔全集》尚未问世,文中原来所引《李渔全集》系德国马汉茂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为方便大陆读者,韩南教授特地改用浙江古籍出版社版《李渔全集》整理本。)一诗中声称,龚鼎孳曾经举债帮助他人。他有一位堪称天才的侍妾眉生(即顾眉,《双梅影阁丛书》本余怀《板桥杂记》卷中载:“顾媚字眉生,又名眉,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肢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译者注),一直随他云游四方。后来,龚鼎孳喜好美色美食的个性受到攻击,参见《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卷二,页273。请注意,李渔为自己在“打秋丰”时携带侍妾的习惯写过几首辩护诗,例如《予携妇女出游,有笑其失计者,诗以解嘲》等(参见《李渔全集》卷二,页183)。人们批评他旅行时像开着一列车队,而他更愿意自比“云游僧”。关于旅行的故事,记录在其有关十首王姬悼亡诗的序言中,参看《后断肠诗十首(有序)》(同上,卷二,页216-221)。

侍郎陈学山、通政司左参议柯耸以及另外一些人。但他们的回信带来的只是大量的赞誉,而非李渔希望的赴京之邀。于是李渔在致龚的信中自己挑明了这件事。在信中,李渔说,他兴奋地得知龚鼎孳正安排在南京购置离自己的“芥子园”不远的“市隐园”。作为园林设计专家,李渔渴望能帮助他计划园林的修葺,从而将自己的观念大规模地付诸实施。然后,他就开始了喋喋不休的抱怨:除了一两次例外,其余都告失败的“讨饭”(“打秋丰”)之旅;他的一大群孩子;还有随之而来的穷困。最后,他宣布了自己的计划——从正在访问的汉阳,前往太原和北京,预期在那儿停留不超过三个月。他请求龚鼎孳做的,就是替他向潜在的资助人说句话。〔2〕

李渔也给吏部右侍郎陈学山写了信,李渔很了解此人,并以坦诚之态相待。当时,陈学山已经回信赞扬了李渔《闲情偶寄》一书的创意,李渔便乘机向陈抒发知己之感。知己——在其面前谈及“资助”有贬身份——是指能够欣赏自己才能与志向的朋友。

渔自解覓梨枣以来,谬以作者自许。鸿文大篇,非吾敢道,若诗歌词曲以及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使数十年来,无一“湖上笠翁”(李渔),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

作为“谈笑之功臣”,李渔将自己的遭际与“博弈、声歌、蹴鞠、说书”的艺人们相比,发现这些人受到王公贵族的欢迎,并被竞相邀约,“接见恐后”。即使以“雕虫小技”而论,《闲情偶寄》亦提供了许多东西,它设计精巧,而最

〔2〕见《与龚芝麓大宗伯》(《李渔全集》卷一,页162-163)。随信尚有四首绝句(同上,卷二,页338)。李渔可能于1657年在杭州首次遇到龚鼎孳,当时龚鼎孳正携眉生游至该处,参见董迁《龚芝麓年谱》第二部分“关于龚的旅行”(《中和学刊》第三卷,第2期[1942年2月]页68)。该次访问南京时,他们即住在市隐园。李渔于1666年在北京遇到龚鼎孳,参见单锦珩编《闲情偶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卷一,页26。龚为李渔的芥子园题过碑文额,并被画入《闲情偶寄》“联匾”第四(同上,页176)。碑上所题时间为己酉(1669)初夏。但龚鼎孳当时在北京,不可能在芥子园替李渔题写碑文(参见董迁《龚芝麓年谱》第三部分,见《中和学刊》第三卷,第3期[1942年3月],页79-88),他一定是在北京写了碑文,然后寄给李渔。

重要的是它的独创。李渔在游“大人”之门期间,从未滥用过主人的好意,他“可亲可近而无可厌倦”,然而,人们却让他“饥死牖下”。

嗟夫!笠翁但不死耳,如其能死,必有怜才叹息之人,以生不同时为恨者。此等“知己”,吾能必之于他年,求之此日正不可得。

昨见惠我之书,有“努力加餐”、“为才自爱”二语,不觉感激流涕,故不避疏狂,放言至此。^[3]

有人想知道陈氏如何对待这封放肆无礼的信,因为它确实无礼。李渔并非寂寂无名,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资助人,包括某些地方上的最高统治者。不过,最后几句话中的讽刺显然并未触怒陈,陈氏继续把李渔当作任性的天才。

李渔的第三封信写给纪映钟,纪氏是诗人兼艺术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国内游历,鬻文为生,数年之后才成为龚鼎孳的幕宾。李渔在南京与纪为邻时就认识他。显然,李渔希望纪氏强化自己对龚氏的请求。应纪的要求,李渔还随信寄去了自己设计的、做过特殊装饰的笺纸样品,并请其转送其他“达官贵人”,其中大概也包括龚鼎孳;并且告诉他们自己来时会带来一批。他还请纪映钟为自己的文集作序,并答应将纪氏尚未读过的部分手稿寄去。此信的基调是轻松愉快的,与给龚氏、陈氏的大相径庭。纪氏与李渔是年辈相当的同道诗人、同路求助者——不是官员。^[4]

最终,计划中的1672年赴京之旅并没有实现,因为李渔最喜爱的另一位侍妾乔姬在汉阳病倒并死去。他返回南京家中,将同样不幸的北京之旅推迟到第二年。

在1673年的北京,李渔不仅为龚鼎孳的辞职,而且为高官们被迫采取谨

[3] 见《与陈学山少宰》(《李渔全集》卷一,页163-166)。李渔与陈学山有二十年的友谊,见《寄答陈学山少宰》(同上,卷二,页189-190)。它是李渔回复陈学山的书信与诗作时所写的两首诗歌之一。请注意,当时另外一位吏部右侍郎是李之芳,李在1640年代曾任金华府推官,亦是李渔的朋友。

[4] 见《与纪伯紫》(《李渔全集》卷一,页166-167)。李渔也寄了首诗,参见《寄纪伯紫》(同上,卷二,页189)。诗中提到,纪的南京旧居离芥子园不远。关于纪氏成为龚鼎孳的幕宾之事,参看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册1,页19-20)。

慎的生活方式所震惊。那些人在遥远的外省接待过李渔，过着地方总督奢华富足的生活，现在却在朝廷的监视下，被迫只能靠官俸度日。李渔讲到自己要去感谢一位朋友（可能就是礼部尚书龚鼎孳）的捐助，朋友不在，李渔在他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张当票，刚好就是送给自己的礼物的钱数。此轶事来自李渔写给柯耸的恳请他资助自己留在北京度过春天的复信中。

但其不得不去者，实有苦衷，敢为知己道之。渔无半亩之田，而有数十口之家，砚田笔耒，止靠一人。一人徂东则东向以待，一人徂西则西向以待。今来自北，则皆北面待哺矣。矧又贱性兢兢，耻为干谒。浪游天下几二十年，未尝敢尽一人之欢。每至一方，必先量其地之所入，足供旅人之所出，又可分余惠以及妻孥，斯无内顾而可久。不则入少出多，势必沿门告贷，务尽主人之欢；一尽主人之欢，则有口则留之，心则速之使去者矣。

渔抵都门数阅月，窃见缙绅先生之债而食者，十居其八。是地主之贫，犹甚于客。闻渔至止，谁不适其馆而授之餐？在故人则尽有终袍之义，在新交亦各治鸡黍之欢。昨有馈书仪十二金，渔往谢而值其不在，见有赞券一纸，伏于砚石之下，取而阅之，则所典之镵数，适与所馈相符，始知贫士上交，累人不浅。

李渔随后重申了其离京的决定：

即今庙堂之上，悉多旧交，皆当日建牙分符于外，而为渔之地主者。请遍讯其人，李子之言不尽诬否？生平若是，奚肯变节于一朝？故南归之志已决。

攀下诸公与台臺同心慰留者，尚不一其人，渔未能遍告。烦以此札代传，即作辞行之公牍可耳。^[5]

为缓和信的语气，他另附短札，感谢柯氏对“草野闲夫”如他的错爱。^[6]

[5] 见《复柯岩初掌科》（《李渔全集》卷一，页204-205）。

[6] 见《又附片札》（同上，卷一，页206），系《复柯岩初掌科》信附文。

从其他信中,我们得知了李渔这一外交行动的成果。陈学山与柯耸敦促清政府官员、时任内阁大学士兼太傅、当朝最有权势的人物索额图劝说李渔留下。(索额图与李渔有些接触,可能就在此事之后。李渔访问过索额图,并为索的花园亭阁书写对联,还送了他一些自己设计的著名的笺纸)。索额图通过陈学山与内阁秘书转达“命令”给李渔,要其留在北京,接受补助。〔7〕

幸运的是,李渔在促成这一安排期间尚未离开北京。他告诉柯耸,自己的行李已经捆好三四天,但却没能离京,因为交通费太贵(“驴价腾涌”)。他汇报说已收到内阁大学士的命令,以及“预筹薪水……由此观之,渔于都门卒岁,十有八九,正与慰留之台翰相符。欲其止而止,此中殆有天焉”。〔8〕

与“殆有天焉”之说相去甚远,李渔似乎像谋划自己的喜剧一样精明地谋划好了这一结局。准此,则在寻求资助的博弈中,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他以此检测自己作为作家的价值,相信他那些有权势的朋友,几乎不可能不作出反应。李渔呼求的不只是一个资助人——尽管看到他的老朋友贫穷的样子,他大概想到了索额图——至少在表面上是整个官僚阶层,他公开声称社会应该养活像他这样取得成就的作家。他的计谋可能显得胆大妄为,但至少比阿谀权势更吸引人——阿谀权势历史古老,而李渔的计谋远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多。〔9〕

无论如何,这就是事情的结局。农历新年早些时候,李渔与那个还活着的侍妾动身返家,侍妾在途中分娩。〔10〕

〔7〕见《复陈学山少宰》(《李渔全集》卷一,页201)和《又与岩初掌科》(同上,卷一,页207)。关于李渔与索额图的接触,参见《题索相国园亭二联》(同上,卷一,页252-253)、《赠索愚庵相国》(同上,卷一,页260)以及《呈索愚庵相国二首》(同上,卷二,页471-472)。

〔8〕见《又与岩初掌科》。

〔9〕在必要的场合,李渔并不坦诚。参见《与卫瀚足直指》(同上,卷一,页160-161),信中他写道:自己离开南京是为了避免尴尬,因为人人都认为他将会从其朋友卫瀚足的委任中得到好处。他忽然显得品德高尚,并巧妙地提醒其朋友。李渔的诗歌偶尔表现出其对于不得不向人求助的不安,参见《旅况》诗(同上,卷二,页114)。

〔10〕见《南归道中生儿自贺二首》(同上,卷二,页221-222)。

这一事件实质上不太重要——李渔的主要作品此前已全部出版,但它展现了李渔生活中某些重复发生的主题。那些书信充分展示了李渔对自己的独创力及剧谈说笑能力的自傲——这在中国的传统作家中并不常见。这一事件同时也揭示了李渔在文学作品中如在生活中,在扮演角色方面——如果需要,可以是个大胆无礼的角色——的高超能力。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从中也看到他终生欠缺保持收支平衡的能力——这一事实限制了他大多数最好的作品。

这一事件亦具有些许欺骗的性质。它提醒我们,在中华帝国,高级甚至中级官员的经济能力如此强大,以致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被迫向他们寻求帮助。尽管李渔认识许多高官,我们还是不能假定这种友谊是对等的。他的地位比他在致陈学山的信中提及的艺人高很多,但依然低于朋友的身份。在他这方面,当他提及全是官员的资助人时采用的方式,与他写给文友和其他朋友时采用的方式之间,有着极细微的差别。在致朋友的信中,他时常抒发对宴乐的厌倦之情,有时甚至贬损主人的品位。^[11]

在李渔的一生中,我们很容易赋予“打秋丰”这一主题过多的重要性。尽管他宣称已纵横中国游历近二十年,但他漫长的“打秋丰之旅”1666年才刚刚开始,当时他赴北京、陕西和甘肃旅行,1668年初到家,但很快又前往广州,1669年初从广州回来,1670年又去福州旅行,1672年去往汉阳,然后在1673年,开始我已描述过的北京之旅。

尽管首次旅行取得了成功,却只是让李渔清偿了所欠的债务,而无法买下如他所述觊觎的地方。(李渔1668年春天或者夏天购买芥子园的钱从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福州之行亦勉强算成功,而其他的旅行则是失败的。

[11] 特别参见下列信件:《东丛木廬》(《李渔全集》卷一,页184),表明李渔准备拜见的显赫有名之士甚至可能并不懂得“(晋人)清谈”为何物。《复唐君宗》(同上,卷一,页184-185),抱怨吃了丰盛食物后即呕吐,请求代以素净的食物和“清谈”。当然,这亦可能是对穷主人的客气说法。但是,这在别处曾被重复提及,如《与李仁熟》(同上,卷一,页196)。李渔泾渭分明地区分他称之为“地主”的资助人和朋友,参见《四字帖辞武林诸亲友之招》(同上,卷一,页189)。

甚至他进行的和旅行相关的交易亦并非总是有利可图。〔12〕

李渔获得一份邀请函之后就安排旅行,并在此基础上,写信给沿途的朋友、熟人。1666年之旅的邀请函,意外地来自陕西巡抚贾汉复。1670年之旅则可能由福建总督刘斗发起,此人三年前在甘肃时就接待过李渔。1672年之旅可能由汉阳太守纪元安排,李渔住杭州时他就是李渔的朋友。〔13〕

为了享乐或者获取声望,或二者兼而有之,在高官——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文人——中,资助作家是极为普遍的做法。在李渔这里,显而易见,是其作为剧作家的名气而不是作为诗人的声誉使其受到欢迎。1666年,在龚鼎孳陪同下,李渔拜见了大学士魏裔介,魏实际上还建议李渔为著名的戏剧《西厢记》撰写南戏版本。另一方面,在1667年,一位地方官员因受邀为李渔新近的剧作撰写评论而深感荣幸。〔14〕李渔接近资助人时,经常论述知己与天才、政客与幕僚之间的传统关系。偶尔他会向资助人暗示,凭借与天才的友情,同样可以获得不朽。

除了作为剧作家的名声外,李渔受到欢迎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他新奇的

〔12〕见《与赵介山》(《李渔全集》卷一,页184):“自此以往,不复有此贱物。”他旅行失败的叙述来自他的“打秋丰”的信,因此值得怀疑。但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了许多同样的话。请注意,他经历了许多简短的“打秋丰之旅”,比如:1664年赴杭州,1671年去苏州,1674年再返杭州。李渔自己声称,甚至是在1668年从西北回来时,他还无力购置向往已久的园子。参见《秦游颇社,归后仅偿积逋,一散无遗,感而赋此》诗(同上,卷二,页111)。但是,显然在当年的六月他就购买了该园,参见方文《李笠翁斋头同王佐军雨宿》,《龠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别集丛刊)本,1979年版,册三,页1037)。方文是李渔的朋友,他花在旅行上的时间甚至比李渔还多。

〔13〕关于李渔与纪元的朋友关系,参见《〈求生录〉序》(《李渔全集》卷一,页31-33)。关于1666年陕西之旅的邀请情况,参见《寄谢贾胶侯大中丞》(同上,卷一,页169)。据说李渔设计了贾氏在北京的“半母园”,此说法来自麟庆(1791—1846)自传《鸿雪因缘图记》(1847年版),参见“半母营园”,在扬州第三集第一部分。这一说法值得怀疑,因为李渔1666年首次访问北京期间,贾汉复并不在京。1673年第二次访问北京之时,也没有提到贾汉复或园林。一个更令人怀疑的说法是,李渔和在北京的不止一处的芥子园有关联。关于贾汉复和刘斗,参见李渔为乔姬与王姬两位侍妾所作的合传《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见《李渔全集》卷一,页95-101)。

〔14〕参见郭传芳为《慎鸾交》所作的序(《李渔全集》卷五,页419-420)。关于李渔修改《西厢记》的建议,参见《音律》(《闲情偶寄》卷一,页26)。李渔的某些资助人偶尔也客串剧作家。关于龚鼎孳写作的一出戏曲,参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册2,页1191)。

想法、专业的学问以及聪明机智,李渔一定是个价值很高的客人。当他写到自己对“说笑”的贡献时,我认为他指的是口语和书面两方面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打秋丰”本身,让他的某些同时代人将他贬损为“小丑”。^[15]

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李渔广受欢迎是因为他那一小“戏班子”姬妾女演员,特别是乔姬和王姬。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想法,不可避免地使人联想到莫里哀(Molière)和他的演员们,但这种说法缺少依据。李渔在1666年和1667年,分别从其资助人那里得到作为礼物的乔、王二姬,这两个女孩仅仅伴随了他六年,都在18岁时离世。每个女孩在能够表演之前必须接受训练。我猜想,1668年新年为主人之妻所演的“生日戏”,是她们首批演出中的一场。她们最后的演出应该是在1672年下半年,因为当时乔姬的肺病已恶化。她们没有随行李渔进行广东之旅,此行占据了1668年的大部分时间和1669年的一点时间;仅有少量证据表明她们在1670年陪同李渔去了福州。因此,她们在芥子园和苏州、汉阳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所中演出的时间,持续不会超过四年。^[16]而且,小规模演出邀请的观众似乎只是李渔的文友,而非其资助人。^[17]我要补充一句:关于那些女孩的耸人听闻的传言,可信度并不高,那

[15] 参见《意中情》:“人以俳优目之。”(《曲海总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册2,页995)关于李渔同辈人对其毁誉不同以及李渔对自己创作的角色的矛盾心态,本书第二章将展开论述。

[16] 关于李渔与二姬的生活,参见他为她俩联合写的传记《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当时他从西北回程,途经彭城(今江苏铜山),受到两位官员的邀请,留在徐州过新年,一位是在杭州时就熟悉的朋友、时任徐州河防同知的纪元,一位是时任儒学教官的李申玉。关于庆贺李申玉妻子生日宴的演出,参见李渔《李申玉阉君寿联》(《李渔全集》卷一,页236)。乔姬在1672年六月份病倒,参见顾景星的诗歌《月湖答李渔五首》(清刻本《白茅堂集》卷十二,页15下)以及李渔《答顾赤方》信(《李渔全集》卷一,页210)。大量证据证明,两位女孩先后在1671年、1672年陪同李渔赴苏州、汉阳,但是在1670年,两人没有陪李渔去福州,李渔只是在“二姬合传”中,富有夸张性地列举她们曾访问的地点时,提到过福建。

[17] 在《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中,李渔列举了好几位喜爱戏曲的卓越文学家,当然,他设法使她们的演出得到尊重,并且宣称乔、王两位女孩常被客人比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侍妾“小蛮、樊素”。除了1668年的新年演出外,人们掌握的所有证据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方文是李渔的一位游方朋友,甚至比李渔更为穷困潦倒,在1669年的节庆场合,他曾带外地来的访客(指侍郎孙鲁山——译者注),小心地携上酒食,到李渔的芥子园饮酒看戏(参见《蠡山集》册三,页988-989)。1670年春天,山东诗人杜濬访问芥子园,并且显然看了戏曲演出,参见杜濬《李笠翁浮白轩》诗(《湄湖吟集》卷七,页4下。清

些传言无疑源于李渔作为色情小说家的名声。^[18]

1673 年事件以后,李渔再没去过北京。但在 1677 年的另一场危机中,李渔给在京师的前资助人写了一封公开信,以绝望的口吻寻求帮助。^[19]他刚刚举家迁回杭州西湖,当地官员便给他买了些房产。但离开南京意味着需立刻清偿债务,所以他被迫出售或典当所有的值钱之物,包括其著作的印版。收入其文集的这封公开信,还附了其朋友、学者兼诗人毛先舒的一条眉批,其口吻是冷嘲热讽式的。在毛氏看来,李渔的卖书所获,历史上少有作家堪与匹敌;其贫困乃是家累太重、谋官失败的结果。

李渔经常将贫穷归咎于其庞大的家眷,1670 年初,其总数多达 50 人,包括妻子、侍妾、孩子、女婿、女仆、佣人等。1660 年第一个儿子出生带来的快

刻本,有 1680 年序)。记载表明,1671 年,在李渔的苏州租屋,二姬为诗人尤侗、宋澹仙、余怀以及李渔一家演出过两场戏。参见《和尤悔庵观家姬演剧,次原韵》(《李渔全集》卷二,页 484-485)、《端阳前五日,尤展成、余澹心、宋澹仙诸子集姑苏寓中,观小鬟演剧,澹心首倡八绝,依韵和之》(同上,卷二,页 347-348)。余怀的诗歌收录在徐轨编《本事诗》(清刻本,卷十一,页 16 上-18 上),与尤侗的答诗在一起。他们的诗歌用来代替按惯例给演员的礼物(缠头)。余怀尚有一首抒情诗,描绘园中的演出,时间大约在 1669 年,参见《同绍村醒斋及笠鸿浮白轩听曲二首》(《余清斋词》,南京国学图书馆 1928 年版,页 57 上-58 上。绍村指著名诗人柴绍炳)。1672 年初,周亮工出席了园中的演出;参见《后断肠诗十首(有序)》注(《李渔全集》卷二,页 216)。根据顾景星《月湖答李渔五首》诗,1672 年,李渔曾带四个侍妾赴汉阳。李渔有首诗,专门描述招待文学朋友们的演出,当中没有一位是“资助人”,时间约为 1672 年二月或者三月,参见《堵天柱、熊荀叔、熊元献、李仁熟四君子携酒过离观小鬟演剧,元献赠诗四绝,倚韵和之》(《李渔全集》卷二,页 331-332)。当然,在当时环境下,某人的侍妾参加演出会被视为伤风败俗。《本事诗》记录了几则其他的事例,但是其中均未提及丈夫的名字。

[18] 有评论家不仅将李渔描绘成一位色情小说作家,而且把他说成是做淫媒的“皮条客”,参见董含《莼乡餐笔》(1868 年《说铃》增订本)卷二,页 21 上。《莼乡餐笔》是一部清初官员所作的批判性笔记。另外一本条目基本相同、运用素材亦多相似的《娜如山房说尤》,被指出自李渔同时代剧作家袁于令,见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引文(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年版,册 1,页 333)。松田静江《李渔短篇小说中的才子佳人》(《短篇小说研究》10 卷 3 期,页 280,1973 年夏季)则怀疑此说法。如果袁于令曾经写过此评论,则一定写于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因为,书中谈及的李渔《一家言》的最初版本不可能早于 1673 年中期,而袁氏卒于 1674 年。显而易见,《莼乡餐笔》同样痛斥包括袁于令在内的其他人。在此情境下,学者们继续相信那样的评论是令人惊讶的。李渔终其一生,都是那种喜欢炫耀、自我标榜之人,他还在世时,就有人收集有关他的杜撰故事。

[19] 见《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李渔全集》卷一,页 224-227)。毛稚黄的评论在《李渔全集》卷一,页 224。

乐,随着 1661 年第二子、1662 年第三、四子的接连出生,变为苦乐参半,甚至于略带沮丧。1666 年将乔姬当作礼物接纳,1667 年接纳王姬与另一位侍妾,1668 年广州之行又购买了一个不知名的女孩作为自己的丫环,这些对其收支平衡都有严重的影响。〔20〕

像李渔的同时代人一样,现代学者有时亦试图替李渔解决财务问题。但不考虑为官的繁琐和危险会给他大胆的独创写作带来的影响就去指责他没有出仕做官,是十分荒唐的——似乎官位对李渔来说唾手可得。一点一点地接受资助与在政府中服务相比,李渔要独立得多。

造成李渔财政困难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就是其冲动的天性。我相信,正是由于冲动和残存的乐观主义,让他一次又一次从事不成功的旅行,尽管他并不喜欢旅行。他宁可动身开始新的旅途,也不愿呆在家中为旧债发愁。此外,尽管他在《闲情偶寄》中强调节俭的美德,但是他向我们讲述的个人轶事表明,他满足感官与审美的欲望时并不顾及自己的经济状况。他将感官与审美需要置于普通的节俭之上,并且以此为傲,这符合他关于自我的观念。于是他长期负债也就不足为奇。

李渔强调节俭时甚至还生发出一幕特定的喜剧,这部分地源于他向别人宣讲自己所缺乏的品质的特别的人性取向。不过节俭的主题也是李渔为非常了解他的那些人执导的有意的笑话,这好像拉封丹(La Fontaine)的蝗虫对拉封丹的蚂蚁宣讲节俭的美德一样。

不管怎样,正如每一个接受古典教育的人一样,李渔也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几乎像大多数人一样,他落榜了。李渔来自浙江兰溪县乡下的一个卑微之家,根据《宗谱》记载,他的祖先从没谋到过一官半职。家族最可夸耀的就是可能在江苏如皋县衙做挂冠医生的伯父。似乎李渔的父亲在那儿经营一

〔20〕见《粤游家报》之四(《李渔全集》卷一,页 187-188)。关于第三、第四个孩子的出生情况,参见《壬寅举第三子,复举第四子》(同上,卷二,页 180)。关于其家庭规模所举的例子,参见《汤》(《闲情偶寄》卷五,页 223),其中,他将自己描绘成“一赤贫之士而养半百口之家”。